

■上论论坛

RCEP: 竞合时代的区域自由贸易新范式



章玉贵

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找不到最优解、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因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影响而面临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当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是向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可预期增长红利要素的关键之举。

有国际主流财经媒体对此发表社评,指出在自由贸易的好处受到质疑、世界各地对全球化担忧上升之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不仅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更提醒世人:自由贸易是实现更大繁荣的最佳途径。

的确,当向来主张自由贸易,且从中获得太多利益的资本主义世界,近年来开始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抗拒自由贸易倾向时,特别需要国际社会有实力参与主体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对自由贸易或曰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大当量支持。而涵盖亚太地区最具增长活力经济体的RCEP,无疑是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好注脚。

就RCEP的15个成员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文化而言,能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谈判最终达成高水平贸易协定,本身就是凝聚成员国的国家智慧和集体智慧的代名词。众所周知,自从亚当·斯密开创现代经济学以来,自由贸易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增进各国民众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亦是全球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但自2017年以来,全球贸易受到了具

有某种强烈政策偏好的因素干扰,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以至于2019年全球贸易量出现了最近十年来的首次下降。而被广泛视为全球在贸易领域最重要公共产品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面临着存续危机,表明个别国家的“败德行为”正在破坏自由贸易的基石,堪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所幸的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9世界贸易报告》,从2005年至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4%,预计未来20年里这一趋势还将保持下去。中国则是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这也是人均GDP跃上1万美金的中国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伙伴释放发展红利的真实体现。

细观RCEP的全部20章条文,尽管内容十分丰富甚至某些条文较为复杂,但最具显著特征的是降低关税。例如,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90%,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原有的“10+1”自贸协定,同时新增了中日、日韩两对重要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关系。特别是中日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减让安排,将大大促进东亚经济贸易一体化。而具有指标意义的开放和统一成员国内部商品贸易的原产地规则,即原产地规则的统一,将十分有利于推动更加广泛意义的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熟悉进出口业务的人都知道,当出口商只需一份原产地证书即可与RCEP协定中的任何成员国合作伙伴进行贸易时,其战略价值就不仅仅是便利化和节约交易成本的相关制度安排,而是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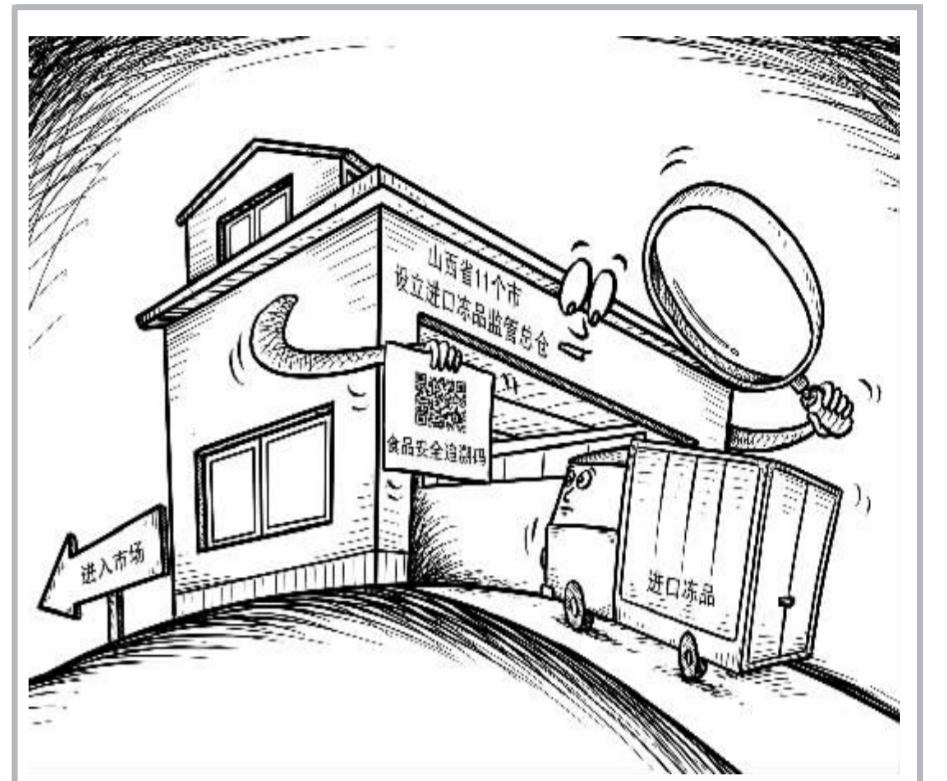
中国目前已在亚太乃至全球产业链上、中、下游三个环节扮演着双重角色。中国不仅是全球中间品最大提供者,而且随着我国近年来致力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开始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核心角色。中国不仅在包括信息、高端装

备制造等领域逐步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而且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上游国,越南等地区性制造中心为下游国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国也由此构建了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而在RCEP的框架下,中外资企业将基于产业与技术分工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对中国企业拓展全球化产业链,还是向区域成员国释放来自中国的资源配置与相关发展红利,均是十分有益的结构化安排。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合作,还是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枢,其形成与发展,都有内在的经济逻辑。既具有全球工业生产与产业格局变迁的周期性与阶段性特点,也具有周期内的稳定性特征。

从全球产业发展史来看,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相继出现了由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的产业分工格局转移,前后持续了200年左右。随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起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也得以在2010年前后成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是自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并向区域和全球不断释放来自中国的增长红利。这波红利的释放,未来将基于制造业的升级、高水平开放以及金融国际化等而陆续展开,而RCEP的适时签署与落地实施,将使释放的增量红利,可能持续30年之久。显然,这将构成21世纪上半叶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贸易进一步便利化的新动力。

竞合时代,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RCEP成员国,通过达成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有效回击了近年来盛行的贸易碎片化、块状化以及国家层面的利己主义,而且有望通过后续的落地实施为全球新型多边投资贸易协定的可复制与推广提供新的发展范式。(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山西设监管总仓加强进口冻品检测

近日,山西省11个市均设立了进口冻品监管总仓,凡进入山西各市范围内的进口冻品,在储存、销售、加工前均进入监管总仓进行集中统一核酸抽检检测和外包装消毒,在取得相关证明、食品安全追溯码后方可出库。进口冻品核酸抽检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所对应批次的进口冻品按有关规定作无害化处理。

漫画 刘道伟

■大视野

国资参与国企改革也要成为混改重要内容

□谭浩俊

“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出资企业和商业类企业上,既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鼓励国有资本投资入股民营企业。”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撰写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一文勾勒了“十四五”分层分类深化混改的图景。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就被列入到重要议事日程,从中央企业到地方国有企业都加快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且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明显拓展,特别是中央企业和地方规模较大的国企,都从此前的二、三级企业实行混改逐步转向一级企业进行混改,改革力度明显加大,改革效率明显提升,民企参与混改的热情也在提升,许多实力较强的民企都参与了国企混改之中,如中国联通,就吸引了多家民企参与改革。而今年以来,铁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军工等其他重点领域混改一直在加速推进、大力推进。地方国企更是力度空前,很多地方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混改方案,并付诸实践。

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毫无疑问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头戏,也是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民企参与国企混改,不仅对国企更好发展、更好适应市

场化要求、让员工更好地转变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提高民间资本使用效率、增强民营企业发展热情、加大民间资本投入力度也起到了催化剂的效果。

也就是说,国企混改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对国企混改充满了热情与期待,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混改、加速混改,提高混改的效率与水平。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很多地方与企业还在推进混改过程中,将员工持股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纳入到国企混改之中,提出多元化的国企改革方案,真正从各个方面调动积极性,提高混改的效率与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要想真正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想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想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仅要把着力点放在国有企业身上,对民营企业也要加大混改力度,要对一些具备混改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吸收国有资本,其他方式资本的方式,增强民营企业的运行效率和发展能力。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科技含量、较高技术水平、较强市场竞争力、较大市场影响力、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民企,也要通过一定方式,吸收国有资本的进入,形成混合所有制结构。如规模较大的互联网企业,就不能只局限于在民营资本、境外资本之间混合,而要有国有资本的参与,并且要能够使得国有资本达到一定比例。

也许有人会说,允许国有资本参与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又会陷入国进民退的格局之中,让民营企业产生担忧呢?显然不会出现。因为,既然提出企业是市场主体的概念,那就要市场面前一律平等,要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看成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是只能让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而不能让国有企业参与民企混改。否则,对企业改革的认知就太过狭隘。

事实上,国有企业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积累较为深厚。同时,国有企业在如何调动社会资源、如何更好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在必要时集聚多方力量等方面的优势,也是多数民营企业难以相比。如果能够把国有企业的优势与民营企业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其竞争力、影响力将更大,也更能发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需要把握好的是,如果能够在国资参与民营企业改革方面迈出重要步伐、让有条件和实力的国有企业参与到国企改革之中,帮助民企二次创业,那么,在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市场环境、营商环境等方面,也要出台更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制度与规范,让民企能够与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只有这样,国资参与民企混改工作才能有序推进。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

优化战略布局 撬动大健康产业“新蓝海”

□张锐

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与2020中国大健康产业峰会日前分别在湖北武汉与广西南宁先后拉开帷幕,作为全球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城市和著名的“长寿之乡”,武汉及南宁扮演会议的东道主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从博览会引来的34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200家企业的盛况,以及产业峰会开幕式所签下的超2300亿元的投资合作协议看,大健康产业彰显出的市场潜力与商业前景的确值得期待。

综合起来看,大健康产业包括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产业,以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为主体的医药产业,以保健食品、健康产业为主体的保健品产业,以健康体检评估、咨询服务、调理康复和保障促进等为主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以融合跨界为主的医养产业等五大基本产业集群。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大健康产业覆盖到一、二、三产业的全过程领域。由此也可以认定,大健康产业不应只是一个民生概念,关系到民众的健康与福祉,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概念,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然更是一个发展概念,关系到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影响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节奏与程度。

比较来看,大健康产业规模在美国经济的占比达到19%,日本为13%,整个发达国家超过了10%,而我国目前仅为6.3%,产业质地尚处开发初期。

事实上,围绕着大健康产业的培育与完善,营养与保健食品首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则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及至前不久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性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在此基础上,过去10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系列重磅文件,顶层设计的政策导向愈来愈强化,相应地推动路径

也越来越明晰。

正是基于市场层面的客观需求以及来自政策层面的激励与导引功能,2020年国内大健康产业规模可达10万亿元,到2030年能够增加到16万亿元,更有乐观预测将达到30万亿元,但无论是保守预测还是乐观展望,大健康产业将跃升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已经不容置疑。但同时又必须看到,撬动这一未来的巨大“新蓝海”,仍然需要战略上的不断调焦以及市场微观层面新动能的挖掘与激发。

首先,大健康产业的拓展离不开公共医疗产品的持续改良与优化布局。按照目前的健康需求层次,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用药品、耗材与器械配置与完善无疑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仍需要公共财政加大对公立医疗与卫生服务领域的投入,切实补齐行业短板,同时推进专利药、中药新药、新型制剂、高端医疗器械等创新能力建设,大力发展生物药、化学药新品种、优质中药、高性能医疗器械、新型辅料包材和制药设备,推动重大药物产业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与健康机构。

其次,大健康产业的升级离不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改造与全程布局。对于医疗等健康服务机构而言,一方面通过流量入口和集成数据可以发现更多需求,进而创造出丰富的健康消费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增加医疗机构的诊断精准度,同时智慧医院可以显著增强求医问诊者的便利性感受。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预测,到2024年,我国搭建大健康市场的数字化支出比重将由目前的3.3%上升到10.6%,相关的投入重点包括:全面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应用信息系统数据采集、集成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的无缝落地,建成高质量的远程医疗应用系统,开发覆盖大健康需求

的多种应用场景等。

再次,大健康产业的强体离不开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普及与素质提升。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大健康的核心是从治疗转向预防,从“治病”为中心转向“治未病”为中心。因此,大健康产业需要从满足下游需求向推动上游需求转移,即帮助公众形成健康风险的预防与发现能力,让各种疾病苗头隔离与扼杀在萌芽状态。对此,须采取措施推动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老年医学的真实落地,注重培育与支持全科医学以及家庭医生等各种健康服务新业态,促进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体检、护理等机构合作发展健康管理组织,提速可穿戴设备、智能健康电子产品和健康医疗移动应用设备的普及,借助数字化渠道与平台向公众实现自我健康管理的充分赋能。

最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健康教育的全面推广与质效提升。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固然需要外部干预,但最根本的还是通过对自我行为的约束来实现,包括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勤于锻炼身体与体育运动、注重饮食的合理搭配、克服不良嗜好等等。为此,需要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提前植入健康教育,同时在大学开设健康教育专业,并支持相关培训机构开展灵活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形成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教育链条。另外,要重点搭建县乡村三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在城镇社区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推行所有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树立健康家庭、健康社区、健康村镇以及健康单位等健康标杆。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商业化不是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最高圭臬,虽然民众健康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大健康产品尤其是医药产品需求的减少,但同时可以使医疗机构将更多精力转移到疾病预防与控制上来,并且相应地健康管理服务需求也会大幅增加,进而带动大健康产业的升级和优化。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让“5G+工业互联网”为高质量发展“+”出更澎湃动力

□张辛欣

一键触屏,消费者可隔空跟进生产线情况;点击屏幕,设定路线,无人驾驶汽车驰骋路上……2020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20日在武汉开幕,一批黑科技亮相,引人注目。

看似酷炫的操作,已在中国制造众多领域展开。人们所穿的服装、驾驶的车辆以及工厂、矿山、港口的运行等等,都因技术的注入而发生着改变。

5G和工业互联网,一个关系着数字经济的基础,一个代表着实体经济的升级,二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用好5G和工业互联网,不仅是为了加速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更将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机遇,注入新动能。

也许有人会问,“5G+工业互联网”究竟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刚刚过去的“双11”,其实你我都在见证。

预售产品、随即上市,不少品牌实现“即买即产”,靠的是对亿级流量的数据分析分析和柔性制造;凌晨下单、早上收货,很多“甩单”秒变“收货单”,里面有大数据调配的功劳;“5G+智慧港口”可以极大减少人工成本,“5G+数字工厂”可大幅提升人均产值……

5G超大带宽容纳大量设备入网上

(据新华社电)

反垄断并非抑制平台经济创新与竞争

□盘和林

近日,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征求意见。其中,首次明确拟将“二选一”定义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将“大数据杀熟”定义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差别待遇。而这些,都是反垄断法明令禁止的行为。

当自带“赢家通吃”属性的互联网平台撞上反垄断,市场立即做出了反应,互联网平台股价出现大幅下跌。这意味着投资者预期这项政策将给平台的经营带来影响。确实,《指南》的出台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平台发展,但这个影响不一定是坏的相反,《指南》通过规范市场行为有可能提升市场整体利益,包括平台企业的利益。比如,《指南》理清了之前多种平台间具有争议的竞争行为,像“二选一”、“补贴、支持”、“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规范,避免企业为了达到“赢家通吃”的规模而进行恶性竞争。因此,《指南》目的就是让平台企业将目光聚焦于科技、创新以及能够提升生产力的工作,这将有效改善企业长期表现。

另外还需要明确的是,《指南》出台是为了鼓励竞争,而非抑制竞争,可能有人认为“二选一”、“补贴、支持”是平台间的竞争,但实际上,这种畸形的竞争后果是真正的产品市场竞争受损,消费者在前期或许能够享受到补贴带来的优惠,但长期来看,最终的市场将是一个平台主导,

而非产品主导的市场。因此,《指南》是通过限制平台恶性竞争来保障产品市场的竞争。

平台经济是一种新业态,它更多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因此平台间的竞争偏向于零和博弈,也就是建立在当前产品市场的博弈,而产品市场的博弈是增量博弈,如果放任平台恶性竞争,有可能造成产品市场竞争受到阻碍,难以提升增量。从这个角度看,《指南》很好地做到了平衡平台与商家的利益,帮助中小企业健康成长,培育良好的平台生态。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指南》明确表示,在特定个案中,如果直接事实证据充足,只有依赖市场支配地位才能实施的行为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且损害效果明显,准确界定相关市场条件不足或非困难,可以不界定相关市场,直接认定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实施了垄断行为。其实不界定相关市场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平台经济不具有传统生产企业的特性,我们很难去界定其市场,其更像是一种高于市场的运营者的存在,因此,我们要用新的视角看待平台经济的垄断,去关注实质行为,而非表象。

总之,《指南》对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包容的,其目的是引导平台经济依法合规经营,促进线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市场大可不必担心平台经济的未来。但我们的目标是一定的,那就是增加全社会福利水平,避免企业靠攫取社会福利畸形成长。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